

三次我們放棄抵抗

我跟王語涵蹲在路邊已經一小時了，連一個長得稍微能看一點的男人都沒看到，王語涵非常焦慮，一直在黑短裙的側邊摸索口袋，當然一件女人的裙子是不會做口袋的。她摸不到口袋，也就沒有菸抽，發出一聲沒氣質的嘖聲，收回手繼續撐著下巴。裙子是我叫她穿的，菸盒也是我拿去丟的，我說我們如果要搞清純女大生的人設就不能有菸，抽菸的女人顯得太世俗，不好騙，不符合我們的目的。我們要釣有錢的帥男人，最好是年輕的，要求實在很多，但是在 Dcard 上徵女友的男大生要求也跟我們一樣多，沒道理他們能有自信我們沒有吧。更何況，我們長得好看，說實在話卸妝後再洗個頭，可能就不那麼好看了，但現在我們有全妝和噴過定型液的捲髮，肯定沒問題。路過的女人能看穿我們的假面，男人則不，他們連我們有沒有化妝都沒辦法分辨。

沒有這張臉，沒有澎鬆的髮根，沒有低胸緊身短上衣，沒有長度膝上十公分的短裙，我們什麼都不是，就算讀到台大也沒有用，這是王語涵被甩之後與我暢飲大罵一整夜的結論。這身行頭也是她提議的，她說如果我們要敗給父權主義就要敗個徹底，我舉雙手雙腳附和，並且提議搭著捷運末班車還能去到東區，釣個多金的 daddy，後半生再也不用努力。

此時王語涵打了個哈欠：「張錫琪，我們還要等嗎？我腳好痠。」

我噌一聲站起來：「是誰說父權主義至高無上不得侵犯，我們要乖乖做他溫順的子民？是誰說女人只要長得好看就是成功的？我們要證明我們沒有錯！」

「夠了吧張錫琪，」她不耐地抓抓髮旋，「我累了，酒勁上來了，我現在超想吐，嘔。」

「父權主義萬歲！」我高舉雙手，內心憤怒不可抑，「陽具中心萬歲！沙文主義萬歲！」

「到底是誰被甩還是我被甩？」

「到底是誰喝酒還是我喝酒？」

「不要吵，我們都有喝。」她乾嘔一聲，站起來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拖走，「走了，不就是生存嘛？忍耐就好。我們一直都是這麼過來的。」

「我不要！」我爆出一聲哭嚎，「我不要----」

那天晚上的鬧劇究竟是怎麼結束的，我已經不記得了。只知道酒醒之後我跟王語涵還是過著普通的日子，普通的工作，普通的讀書，普通的掙扎著做一個獨立有主見的新好女人。

王語涵是讀哲學的，我是讀外文的，這可謂是天大的不幸，在思想方面或生存方面都是。因此我們大學畢業之後仍繼續在學術界裡鬼混，躲在象牙塔裡死不出來。我沒在寫論文的時候在當大學助教，大一必修西洋文學概論，授課

教授當然是我的指導教授，他上課很涼給分很甜，那些大一新生還不懂得翹課，因此課堂人數總是有八分滿。下課總是有人來問我問題，他們剛從高中裡被放出來，還不知道助教是個怎麼樣的貨色，對我說話老是畢恭畢敬，甚至叫我老師，我不過是個學術廢物，哪有那種底氣自稱老師，於是都要帶著雞皮疙瘩糾正他們，別用那種正經八百的語氣稱呼我。

他們的問題毫無意外與文學有關，他們充滿熱忱，雙眼閃閃發光，人生充滿各種可能性，看著就讓人感到煩躁。我早已看穿文學自命清高的假面，之所以還待在學術界不過是不想出去面對低薪的事實，混吃等死而已。他們之中最熱情的莫過於 Selina，她看起來十分快樂，彷彿此生沒有失眠過一次。我懷疑她這種人怎麼會來讀文學，沒有任何一點憂鬱傾向的人讀得懂文學嗎？

Selina 有一次認認真真地問我，為什麼文學一點也不快樂？為什麼我們不能讀點讓人快樂的東西呢？我隨口回答，有啊，莎士比亞不是寫了一堆喜劇嗎？仲夏夜之夢？威尼斯商人？皆大歡喜？Selina 顯然不滿意這個答案。「可是莎士比亞有名的是悲劇！」她嘟嘴反駁。

「為什麼是罪與罰呢？為什麼是傲慢與偏見呢？為什麼是戰爭與和平呢？一點快樂的東西也沒有！」

「你要快樂的東西幹嘛？又不是喜劇演員。」我說。

「可是……」她左思右想，最後憋出一句，「助教，追求快樂難道錯了嗎？」

我啞口無言。快樂！一個多麼陌生的詞語，當它和追求組合在一起，更顯得遙不可及。我很早之前就把這個詞組給丟掉了，Selina 果然不適合讀文學。我希望她大二的時候就能看清現實，然後轉到一個商學院的隨便什麼系去。

追求快樂！我要是問王語涵，她肯定也是一頭霧水。當我們決定要考明星女中、再考頂尖大學的時候，這個詞組便已經離我們遠去了。更何況，當人說「追求」的時候，不就代表追求二字後面是我們缺乏的東西嗎？我最後並沒有回答 Selina，只是笑笑假裝助教愛莫能助，事實上我是不忍心告訴她答案。要我回答 Selina 的問題，我會說，因為人本來就是不快樂的。尤其是我們這種感覺什麼都有、什麼都可以擁有的菁英份子，更是顯得艱苦。問題是，你要當快樂的豬，還是痛苦的蘇格拉底？這是二選一，知道的越多，人越痛苦。

雖然如此，但我想我是隻痛苦的豬。

我曾決定要在下輩子當隻快樂的小狗，如果此生已注定無法快樂，那來世總可以期待吧！但王語涵徹底打破我對來世的希望，她有一次向我鉅細靡遺地描述了一隻有憂鬱症的狗，講牠是如何被主人斥責咒罵，被拴在陽台上風吹雨淋，聽完後我對轉生為狗的幻想徹底破滅。連狗都得憂鬱症，這是什麼世界？因為我轉念決定要當一隻水母，沒有大腦，成天只要在海裡漂來漂去就好，直到我又有一次，在 YouTube 上看到一個日本人將活生生的水母泡進醬油裡，做成醃製小菜來吃。看到時我用盡肺中氧氣爆出一連串髒話，連水母都不得安息，這世界上真的有我安身立命之地嗎？這是什麼世界？

我把這事告訴王語涵，她仰頭大笑，邊擦眼淚邊提議我可以當一顆石頭。我說無機物不能進入輪迴系統，她辯稱某種哲學理論將無機物也納入輪迴說，我反問那一顆石頭裂成兩半，它（們）會擁有一個意識還是兩個意識？王語涵不急不徐，朗聲說道這是一個哲學問題，值得研究。

哲學問題！快樂也是一種哲學問題。王語涵還不放棄追求快樂，所以她拚了命地投入愛情裡，要找到一個值得相守一生的好男人。我不是同性戀，可是男人這種東西真的是不可靠。每一次她被父權體制反彈回來，提著一手啤酒來找我，我們都要把各種女性主義翻出來複習，到最後我們總是破罐破摔，互相說我們從明天開始全妝出門，永遠只穿爆乳內衣，在意自己的唇膏顏色更甚於考卷上的紅字，這樣地投奔父權紅利吧，抵抗社會真的是太難了。然後我們就站到街上去吹一個小時的冷風，醒醒腦子，再爬回書桌前，準備明天截止的論文截稿日。

抵抗社會實在是我們一生的課題。知道的越多，需要抵抗的越多，尤其是身為女人。讀外文和哲學實在是天大的不幸，我們對這個社會知道的實在是太多了。例如說吧，街友。今天你給街友一百塊，讓他去買飯吃，他不餓了，但是他還會冷，會痛，會長病，會渴，而且過幾個小時之後他又會餓了，這一點也沒辦法解決問題。如果你不知道這是個結構性問題，你會自豪自己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可是問題就出在我們知道這是個結構性問題，街友不是因為懶惰而無家可歸，可能是因為工廠大量採購自動化設備取代傳統人力，才導致這個街友失業，最後只能露宿街頭。當你知道這些背景之後就不能用做善事的眼光看街友了，你會覺得整個社會都有病，應該做點改變。於是你發奮讀書，以為站在學歷的金字塔頂端就能改變世界，然而在台大多讀幾年之後，會發現我們拚盡全力推動世界，可是這個世界可曾偏離軌道一分一毫？個人的力量之渺小，根本不能改變什麼。

如果不能改變世界，至少也讓我們大富大貴吧。不是這樣的嗎？對父母來說，讀好學校不僅是光宗耀祖，還要能得到一份好薪水。但事實是，台大的就業博覽會是開給理組學生的，文組學生最好不要去。流傳在文學院的笑話是這樣的：有一天一個日文系的學姊在宿舍讀書，實在讀到心情低落，決定離開宿舍到外面走走。校園內剛好在辦就業博覽會，她逛了一圈，找不到一個攤位願意收日文系的畢業生，於是心情更沮喪了。事實是，這個社會根本不重視人文科學，然而自然科學在社會中創造的問題，還要我們這些人文科學學者來處理。曾經我在大學時修過一門森林醫學的課，客座教授花了兩個小時滔滔不絕講述森林如何增進人體健康，提出眼花撩亂的數據和實驗證明，帶來自己種植的薄荷枝葉發送給大家，說在室內每多少平方公尺放一盆盆栽會有抗癌的效果，諸如此類，吧啦吧啦吧啦。最後結束時，教授不知道哪根筋不對，突然提起大學國文課是否留存的議題（這在那年是時下流行的話題之一），他微笑著說大學國文當然要留著啊，我們的學生要多讀一點弟子規和三字經才行，聽了我差點沒昏死過去。弟子規和三字經！多麼過時的文本！更何況，大學國文根

本不是在上三字經跟弟子規。這個人甚至是台大的教授，可見我們的人文教育多麼絕望。

我跟王語涵會這麼厭世不是沒有原因的。

草東沒有派對剛出新專輯的那一陣子，我都在循環播放那張《瓦合》。瓦合瓦合，「破瓦相合，雖聚而不齊」，真是好個烏合之眾。他們在小巨蛋開唱，我沒去搶票，粉絲們去聽隔牆有耳，我也沒跟著去湊熱鬧。我只是在我狹小的單人宿舍裡一遍一遍地聽，頭抵著床頭板，抱著鯊魚布偶不停地流淚。我想起我的指導教授，四十多歲的男子，英國牛津大學的文學博士，現在在台大教書，總是穿著一身星際大戰的帽 T 晃來晃去，有一次我撞見他捧著超商領回來的蝦皮包裹，邊哼著歌邊拐進辦公室裡去，非常快活的樣子。他上課從不點名，沒有個人或小組報告，就考個期中期末，並且將大半分數放在選擇題上，學生隨隨便便就能拿到 A+。我想起他總是覺得茫然，牛津大學的博士？那該多努力多用功才能拿到的學位，他卻完全不像是個勤奮向上的人。為什麼選擇去讀博士？為什麼選擇成為教授？這一切難道也和我一樣，只是為了混口飯吃而已嗎，那又何必是牛津呢。我以為他會有過人的熱情才華，但顯然他只是個普通的中年男子。他完全沒有展現出與他的學位相稱的特質，平凡得毫不起眼。我想我是否也會成為那樣子，快活，自在，毫不在意功名與利。那其實也是挺好的。

我其實不知道我的學術生涯要持續到什麼時候，也許我研究所讀完，我就願意進社會去工作了。又或許我會繼續這樣逃避下去，一路讀到博士，變成教授，變成跟我的指導教授一樣的人。我想起我大一時認識一個博士班的學長，他讀完外文系又念了外文所，外文所念完又讀了外文系博士，問他以後要做什麼工作，他揮一揮手：「不要問這麼傷感情的問題。」學長很少寫作，一寫就拿了台大文學獎首獎，又拿了獎中之獎超新星，又拿了台北文學獎，一直得獎，感覺他就是有那個明星命。我想我沒有，我寫了非常多東西，一而再再而三地寫，掏心掏肺直到自己嘔吐不止，但是什麼也沒有得，後來我就放棄了。文學對我來說如此徒勞，什麼也不能拯救，你看邱妙津寫了那麼多，一寫再寫，不斷傾吐不斷吼叫不斷叨嘮，最後還是死了。活下來的賴香吟也說，寫作不能治癒。朱宥勳在他的 YouTube 頻道說，的確有些人選擇自殺，但在此之外，文學已經拯救很多人了。我不知道要不要相信這個，我好像沒有被算在被拯救的那群人裡面，然而為什麼時至今日我還為了存活苦苦掙扎呢？工作，學術，說穿了不過是物質上的生存的問題。為什麼我不能普通地選擇成為一個英文助理就好？為什麼到了這個時候我都還在斤斤計較我存活的方式？

說到嘔吐，有一陣子我的乾嘔病非常嚴重，我是說真實的反胃感，從胃裡冒上喉頭的一聲「嘔嗚」。起先是看見油膩的食物時會忍不住一陣胃酸翻湧，

然後變成看見討厭的食物就想嘔吐，嘔吐的頻率逐漸上漲，幾乎變成餐前儀式，到最後甚至連隔著螢幕看 YouTuber 吃飯也會不住乾嘔，彷彿我的胃打從心底拒絕食物的存在。沒有吃食，這也是個存活的問題。我去掛腸胃科，醫生喃喃低語問了幾個問題，壓了壓我的胃，表情百思不得其解，問我要不要照胃鏡，我聽說那體驗簡直像被強姦，堅決拒絕。醫生毫無辦法，只得開兩週份的胃藥給我，加減治療。我那兩週藥吃得很勤，卻沒有一點改善，又去看了腸胃科，這次終於同意照無痛胃鏡，醫生檢視那粉紅色的肉管，喃喃說顏色和形狀都相當漂亮，又開了兩週份的胃藥給我。王語涵聽說此事，把我踢到身心科門診去，我在醫生的指示下拿到了桃粉色小藥丸，名字叫永康緒，永保健康的思緒，非常抗焦慮藥物的名稱，大小只有小指指甲那般大。就是這麼小的藥丸把我積累一年的乾嘔病治好了，並且藥到病除，服藥的期間乾嘔消失得一乾二淨，發現這事我氣得要死，原來這存活的問題竟然是心靈上的，真是受夠了。

從那之後我再也戒不掉抗焦慮藥物，一停藥就嘔吐，只能一直服藥。我因此戴上精神病患者的名牌，不是鑲金包銀的那種，大概只是實習生名牌。我感受著我的新身份，名牌看久了也覺得挺相襯的，於是開始把自己當作精神病患來活動，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破除大眾對精神疾病的迷思。「我是精神病患但我不是神經病」，我要傳達的是這個，於是主動地向不熟識的陌生人承認自己有焦慮症，還在能夠上台報告的場合把主題訂做精神疾病，盡可能地公開討論，我相信公開討論是正視議題的第一個步驟。但是做得越多，我越發現那些他人的歧視不斷被重複，被我重複，被我的聽眾重複，我一遍一遍在我的對話者眼中看見嫌惡和恐懼，我本來可以不用忍受這種嫌惡歧視與恐懼的，只要我掩飾面孔過活就好。王語涵說得對，所謂存活，所謂生活，不過忍耐二字而已。於是我又一次放棄了，放棄抵抗這個社會，群眾的目光是如此強大，我被這樣的探照燈掃射，刺眼得睜不開眼睛。

《瓦合》的最後一首歌叫做〈但〉，非常有《等待果陀》的味道，歌詞是這樣的：

「你說你不想在這裡
我也不想在這裡
但是天黑得太快想走早就來不及
喔我愛你
可惜關係變成沒關係
問題是沒問題
於是我們繼續」
於是我們繼續！

還要許多年後王語涵才會結婚，在這裡她做了一個關鍵性的決定：她不要再和男人約會了。她本來就是雙性戀，拋棄了男人還有女人可以選。父權主義

和恐同被放在天秤上，竟然是父權主義的那一端下沉，我就算做夢也想不到。大概是同志還懂得團結起來對抗異性戀霸權，女人卻難以一齊對抗男性。王語涵身為一個女雙性戀，根本擁有當臥底的天份，在異性戀面前她可以大力讚美肌肉男小鮮肉，在同性戀面前她則改口意淫帥 T 長髮妹。所謂生存，不過忍耐二字，掩飾二字而已。那些面貌都是王語涵，她只是選擇在別人凝視她的時候把光往自己身上打三十度、四十五度、九十度，關燈之後一片黑暗裡面到底是什麼模樣，得用赤裸的手去摸。我不喜歡光，總是躲在暗處，不想被凝視。正因為我總是在暗處，她才願意拿著一手啤酒來跟我說真話，因為我們在彼此身上無利可圖。她的真話是，她討厭這個世界，她討厭需要抵抗的一切，她討厭知道的太多，活著非常疲倦。在這裡她決定活得簡單一點，父權或恐同，選一個忍受就好。

Selina 大二的時候還是沒轉系，我當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助教時又遇見她，還是那麼快樂。有一次，她看著我操作手機，突然很新奇地問：「學姐，為什麼你這個資料夾叫公館公園？」

那個資料夾放著所有台大開發的教學 APP。我一時無言，找不到字句來解釋。因為台大根本只是一個過於空曠的大公園，風呼蕭蕭地從中間穿過，什麼學術殿堂，完全沒那回事，這裡只是一個三月的時候適合高中生和退休阿桑來賞杜鵑花的植物園而已。Selina 如果沒有感受到這些，我什麼也沒辦法向她說，對這種水泥牆打拳就是徒勞而已。這些日子我越來越懶得說話，沉默地待在台大的自習室裡，寫我那不知所云的論文。自習室很安靜，唯一的噪音是下課時學生笑語聲聲從窗外走過，隔著一層冷氣冰涼的玻璃窗去看他們，就像海產店水族箱的魚隔著玻璃青苔向外看。我記得我也曾經是這般充滿愛與希望的樣子，可是我咬了夢想的餌，上了受苦的魚鉤，於是就在這水族箱裡面了。

王語涵做了關鍵的決定之後，果真談起認真的戀愛來了。眼看她就要從這棵等待的枯樹下離開，我著急跳腳，一連發了許多訊息給她，她卻不讀不回。失去了談話的對象，我無路可走，又拿起筆開始寫作了。我一寫就是遠超過《瓦合》整張專輯時長的距離，不停傾吐不停吐露不停呢喃，語言顛倒混亂，前不著村後不著店，被遺棄在這荒野裡。累了就倒頭睡去，醒來後重看自己寫下的東西，一片雜草漫生，遂一把大火全部燒去，用灰燼捏成一支新筆繼續再寫。這麼強烈的表達慾究竟是為了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不明白，寫作明明如此徒勞，為什麼我還在這裡一筆一劃地寫，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的生命如此空虛，二十多年都普普通通地活過來了。小時候我會期待，等我二十幾歲的時候能有一番成就，成為偉大的人。然而時間快轉來到二十幾歲的中間，我才發現一切成就和我的幸福快樂無關。讀了明星女中，考上頂尖大學，最後還是焦慮症纏身，靠著偽裝自己活在世界上。有句話是這樣說的：「愛與希望是會殺人的烏托邦。」說得真對，夢想也是。我記得在歐洲文學史的課堂上學《包法利夫人》的時候，助教在討論課上問福婁拜如何呈現「自由與快樂」的命題，我舉手答福婁拜對於自由與快樂是悲觀的，他不相信世界上

真有自由與快樂，所謂自由與快樂是苦難女神用來誘惑人類的紅蘿蔔，背後的目的就是要人類承受更多的受苦。那堂課基本上沒有人發言，大家都只是坐在位子上拿個出席分，那時卻有個女生主動發言反駁我，說她認為即便包法利夫人最後自殺而死，她在外遇中獲得的滿足感也不是不值得追求的。我急急站起來，不可思議地瞪大眼睛，連珠砲似地追問你怎麼可以說包法利夫人有過一瞬間的幸福，難道福婁拜讓包法利夫人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是為了表達幸福快樂值得追求嗎？我來不及說完，下課鐘就響了，助教用三言兩語為課堂作結，眾人一哄而散。我愣愣地站在原地，那個女生在離開前回頭看了我一眼，那滿懷不理解和不屑的眼神，一下子就把我推到了角落。就是那時候我發現自己與他人是如此地不同，像是鑽石和石墨的不同，我就算用正常人的假面將自己遮掩住，那多生的犄角還是會從布料下突出，顯示底下的怪物。

小時候我讀了太多小說，經常懷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別人寫成的，例如說現在經過我的這個阿姨，是不是在離開我的視線之後就會換下一身衣服，穿上另一套西裝，戴上假髮和公事包，然後再次從我視線盡頭出現，走過我身邊。他們這麼大費周章地鋪陳這些街景，擺放這些路人，就是為了不讓我發現我是書中的一個角色，命運已被無名之手寫定。現在想想真是有道理，也許這幾年我都被作者的帽子戲法給耍了，忙著關注一些不可觸及的幻影，女權之類，社會議題之類，生存之類，工作之類，學術之類，把這個幾乎逼近真相的領悟給忘記了。現在我仔細聽聽，好像真的能夠聽到有一雙匿名的雙手在敲打鍵盤，把我的一思一緒全部寫下來，好像能夠聽到他苦苦沉思的呻吟聲，看見他在那在書房裡獨坐的身影。是的，就是了，我要伸出雙手，去觸摸這個不可能被感知的四面牆，我想它就在這裡，我現在把兩個手掌都放在牆面上了，我看不見它，但是我摸到它了，摸到它它就逃不掉了。現在我在這面牆上四處摸索，我想應該有個暗扣，可以打開隱藏的門，然後我就可以從這個長滿黃斑的研究生宿舍逃出去了。可是逃出去之後要面對什麼呢，會不會是死亡？喔，對，因為我是書中的角色，我不能獨立於書本而活。死亡！多麼令人發抖的字眼。我還是離開這面牆吧，我好像聽見作者在微微地點頭微笑，讚許我這麼做，因為這樣做他就可以繼續寫下去了。

離開看不見的牆，回到木頭書桌前，支頭苦思。這篇小說再一千字就會結束了，在這剩餘的字數裡，我還要做些什麼呢？很快的所有的場景會被重置，對話會被倒退，人物回到最一開始的定位點，等待再次被閱讀。在這終幕，我還能做什麼呢？來幫我有限的生命做一個結尾吧。感謝生養我的爸媽，感謝一路支持我的夥伴，雖然你們的命運就是注定要來襯托我這個主角，而我注定會是個失敗者，因此你們的努力也連帶著是失敗的，但姑且還是在終幕提及你們的名字。感謝 Selina 做我的反面，感謝王語涵做我的同類，我的生命因為你們而顯得立體了。感謝生命的一切，用極其成功的姿態完美還原了失敗的場面，沒有比這更有力的諷刺了。

宿舍的門被人敲響，在這最後的最後會是誰來拜訪我呢？我從書桌站起身，跨過地上的髒衣服和書堆，來到斑駁的門前，把門打開。王語涵站在那裡，渾身濕透。她舉起手中的超商塑膠袋，裡頭裝滿了罐身濕答答的啤酒，不多不少正好一手。她定定望著我，開口說：

「我們真的該走了。」

（我們一動也不動。）